

〈論説〉

《红楼梦》の民俗学研究

——先行研究及問題点

周 芳 汀

摘要:《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伟大著作,对民俗的描写遍布全书,为中国传统民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红楼梦》的民俗学研究并不完善,因此本文以《红楼梦》的民俗学研究为主题,通过对先行研究的分析找出其问题点,以达到真正从民俗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

关键词:《红楼梦》;民俗

『紅樓夢』の民俗学的研究

—先行研究とその問題点—

要旨:『紅樓夢』は中国文学史上の偉大な著作として、民俗の描写は全書に広がり、中国伝統民俗の研究に貴重な資料を提供した。しかし、先人の研究成果を見ると、『紅樓夢』の民俗学的研究は完全ではないため、本文は『紅樓夢』の民俗学的研究をテーマとし、先行研究の分析を通じてその問題点を探し出し、本当の民俗学の角度から『紅樓夢』を研究する目的を達成した。

キーワード:『紅樓夢』、民俗

Folklore Study of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Previous Research and Its Problems

Abstract: as a grea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describes folk customs all over the book, providing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customs. However,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e study on the folklore of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is not perfect.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study on the folklore of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as the theme and finds out the problem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so as to truly study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Keywords: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Folklore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广为传播。世界各国学者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不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涉及到《红楼梦》的各个方面。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一批主张以民俗学视角研究《红楼梦》的民俗学家，如钟敬文、陈勤建等，但他们都只是提出了理论框架，并没有明确具体的研究方法。进入90年代，《红楼梦》的民俗学研究的相关论文面世，2000年以后《红楼梦》中民俗学研究的专著陆续出版，但中国“红学”的民俗学研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亚洲范围内，《红楼梦》传播最广的国家非日本莫属。自1793年《红楼梦》自中国的乍浦港乘船来到日本长崎以来，日本“红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二百余年间，日本历代学人对《红楼梦》的翻译、注解、评论和研究遍构成了‘日本红学’的历史。”然而从民俗学的角度审视日本“红学”，其研究并不深入，目前为止所选用的参考资料也只有少量的古代民俗记录（如《东京梦华录》、《荆楚岁时记》等），并不是从民俗学及视角出发进行的民俗学研究。因此本文将着眼于中国与日本的《红楼梦》民俗学研

究，将先行研究及其问题点按照“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三个阶段进行区分，以民俗学的研究理论及方法依次进行分析。

一、1980年代：钟敬文的民俗学与民俗学

1、钟敬文的民俗学与古典文学

钟敬文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1922年钟敬文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经著名民俗学者顾颉刚介绍，进入中山大学文学系任助教。同年12月，北大《歌谣》周刊引入了“民俗学”一词，拉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帷幕。1927年11月中山大学成立了第一个民俗学会，钟敬文加入学会并编写《民间文艺》、《民俗》等书，开始了他的民俗学研究生涯。1928年钟敬文赴杭州任教，在杭州创建了民俗学会，也是这一年出刊《民俗周刊》杂志，“民俗学”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关注。在此期间钟敬文也受到了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西村真次、松村武雄等人的影响，并于193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民俗学。在日留学期间钟敬文与日本民俗学者、文化史学者广泛对话，从不同角度吸收他们的成果，充实中国民俗学。但由于战争原因，钟敬文于1936年回国，在杭州继续进行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毅然选择以笔为枪，活跃在抗日文学创作的第一线，并在两广地区建立了中国文艺抗战协会分会。1941年钟敬文重回中山大学任教，1947年却因“左”倾被解聘，后赴香港任教并创立中国文学协会香港分会。1949年钟敬文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间文学与文学相关课程，并被任命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副会长，1953年在北师大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研究生班。在此期间钟敬文不仅为中国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呕心沥血，也一直进行着相关的研究，但好景不长，1957年钟敬文被划为右派并解除职务，之后便悄悄进行着民间文艺的研究。1966年起，民俗学的研究被迫停止了十年之久，“文革”结束之后钟敬文便着手开始恢复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1979年他开

始编写《民间文学概论》，1983年还建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可以说钟敬文先生用自己的一生见证了民俗学的诞生与发展。

1985年10月，《文史知识》刊发了钟敬文先生的“答《文史知识》编辑部同志访问的谈话记录”，题为《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他从“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和“研究古典文学如何借鉴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三个方面阐释了民俗学和古典文学的关系。

第一、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

①民俗学的范围和民间文学的关系：

这一部分中简单介绍了在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中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占有重要的位置，以及传统的研究者们认为应该把民间文学归入民俗学的研究范围的原因。

②古典文学的范围和民间文学的关系

这一部分中介绍了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在体裁、题材、思想感情和形式（包括形制格式、修辞手段等）方面的关系，并以《诗经》、《楚辞》、四大名著等具体例子说明古典文学的创作受到了民间文学的诸多影响。

第二、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

该部分以《诗经》、《楚辞》、《高唐赋》、《颜氏家训》等文学作品为例，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量的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地方民俗。同时申明如果不仅把眼光局限于狭义的古典文学，而是扩大至广义的文学范围，那么我们会发现更多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民俗资料。这也就更加说明了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的密切关系，进而启示我们可以从二者的不同角度对之进行研究。

第三、研究古典文学如何借鉴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这一部分具体阐述了古典文学的研究为什么要借鉴民俗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逐渐变为文献；而民俗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则着眼于现在的种种文化现象。因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已经固定，古典文学的研究模式多年来处于单一化，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寻找新的路径。因此目前古典文学的研究向民俗学借鉴

理论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钟敬文还提出了如实地调查、类型化比较研究、地域性研究等几个重要的民俗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并分析了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怎样加以运用。

纵观全文，其结论是：“民俗学和古典文学研究都属于人文科学，两者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的。人类社会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两种学科之间是可以乃至应该相互沟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丰富古典文学的研究手段、研究角度无疑会有裨益。”这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民俗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引路作用。

2、20世纪80年代古典文学的民俗学研究

中国民俗学者苑利认为，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风俗方面（比如服装、饮食、婚嫁、丧葬、时令的礼节等等）②宗教方面（比如神道、庙宇、巫祝、赛会等等）③文艺方面（比如戏剧、歌曲、歌谣、谜语等等）。①、②两方面与古典文学的联系一般可以从“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这一角度来把握，比如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吴均《续齐谐记》的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离开了对这些民俗现象的了解，我们对古典名著的解读就会留下空白或者死角。第③方面与古典文学的联系，可以从“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这一角度来加以把握。在中国文学史上，民间文学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比如《诗经》中的《国风》、汉魏时期的乐府民歌、由后人补述的上古神话与传说、宋元明清的讲唱文学、明清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众所周知的例证；中国文学的若干体裁，也多是从民间文学衍生发展而来的。这样一些事实表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关系。

学者王齐洲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时发现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关注中国古典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关系的学者，鲁迅就是时间较早而且成果颇丰的一位。1927年鲁迅就曾经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中讲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和酒之间的关系，这在现代学术史上开了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先河。现代学者闻一多在用民俗学观点阐释中国古代神话方面颇

有建树。1930年至1940年，他先后创作《伏羲考》、《龙凤》等，解决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还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白话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等，其中涉及《国风》、楚辞、汉魏乐府、宋元明清讲唱文学、明清章回体小说的部分也占相当比重。由此可见，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上取得了很大成果。

然而纵观前人的研究，虽硕果累累，但也不免存在遗憾。第一，对“一般古典文学中的民俗现象”考察不够。日本民俗学家井之口章次认为，文艺民俗学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向：“第一方向，为了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因此一定要借助民俗学。第二个方向，要了解民间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因为在现实上，文学素材往往就是民间传承。第三个方向，再进一步，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也可称之为文献民俗学的方向。”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上述鲁迅、闻一多等人的研究可归在第一个方向；《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名著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立著过程中的种种细致考察可归在第二类，即文学源流的研究；而第三方面，即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进而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开展民俗学研究这一部分与前两个方向相比则较为薄弱，并进而导致了第二个问题的出现——古典文学的研究很少借鉴民俗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因此出现了一些阐释偏差。因此钟敬文先生提出要善于借鉴和运用民俗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一是注重田野调查，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将调查的结果用于弥补文献考证的缺失和不足。在实地调查中收集的民间传说、文物遗迹，与文献记录相结合，用这种方法会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二是注重类型的、比较的研究。这是民俗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因为传统性、类型化，正是民俗现象的基本特征之一。可是古典文学的研究中长期应用的是典型理论。这就常常导致研究过程中有一些问题说不通。因此要注重把握民俗现象的类型化特征，以免因为强调个性化和典型化而误解了文学的内涵。三是注重地域性的研究。比如在研究《红楼梦》中的民俗学时，就要考虑到《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地点以及当时当地的政治现状、经济条件、文化基础、社会

风尚等各个因素。

总之，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比如文艺学、美学、社会学等等，当然也可以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有一些民俗学者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古典文学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想必当时中国的研究学者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影响。由此可见，如果借助民俗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多一个角度进行研究，那么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反之则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误。

钟敬文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民俗学研究的先导，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文艺民俗学”的新概念，也提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要借鉴民俗学的方法和理论，但他并没有提出这门学科具体的理论构建，也并不清楚在研究过程中的具体做法。正如民俗学者赵云芳在她《民俗学视野中的〈红楼梦〉》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勤建、宋德胤、秦耕等学人都各自提出文艺民俗学的理论框架。陈勤建注重用民俗学手段来考察文学作品，把文学作品中的民俗基因、民俗意象和民俗原型等理论作为文艺民俗学学科框架的理论基础，为建构系统的文艺民俗学批评提供初步理论依据和价值参考系。

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红学”的民俗研究

中国红学界的民俗学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才陆续出现了穆光、志乔、胡文彬等站在民俗学视角分析《红楼梦》的学者，相关论著也陆续面世。

1、穆光《从〈红楼梦〉的民族事象看其民族学价值》

1991年穆光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从〈红楼梦〉的民族事象看其民族学价值》，是国内最早的一篇涉及《红楼梦》中民俗学的文章。该文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三大方面完成了对《红楼梦》中所蕴含的民俗事象及其价值的初步探究。

物质民俗方面：

作者列出了文本中提及的服饰，并直接阐明了具有满洲特色，还简略介绍了《红楼梦》中饮食的特点——既具有满族风情，又“带有一番北方少数民族的豪情。”

社会民俗方面：

作者分为两大类进行介绍。第一类是人生礼仪民俗，介绍了《红楼梦》中的婚嫁礼仪、丧葬礼俗和孝道文化。在婚嫁礼仪的部分作者先是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婚姻程序，而后列举出《红楼梦》文本中所描写的宝玉婚俗，经对比宝玉的婚礼程序完全沿袭了中国古代婚俗旧制，并点明这是典型的汉族婚嫁习俗。丧葬礼俗的部分构成与婚俗部分基本一致，先是借助了《礼记》、《清宫遗闻》、《津门杂记》等作为参考资料，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丧葬习俗，并与《红楼梦》文本中描写的秦可卿的葬礼流程、秦钟丧事等进行对比，得出“〈红楼梦〉中的丧葬习俗在较大程度上承袭了汉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结论。同时还简略介绍了《红楼梦》中的丧葬装束多延续旧制。相比婚礼，丧葬礼俗的民俗意义更为古老，受巫术影响较大，是人生礼仪中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孝道这一部分借助《明太祖实录》中所记载的敬老之俗，与《红楼梦》第43回中描写的年轻人拜见老人的情节相对比，可“这与东北满族的风俗礼节完全一致”，其中“问好”、“问安”、“定省”之俗严格来说是沿袭元朝蒙古贵族之俗。由此可见《红楼梦》确实为研究满清时期的社会习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二类是岁时民俗，这一部分作者选取了从腊月到除夕的一系列活动、正月十五元宵节、中秋节为例，与《荆楚岁时记》、《礼记》中记载的中国古代节日流程进行对比，指出除夕“拜影”为典型的满人礼仪，最早可追溯到辽，汉族也有此习俗。除夕之夜放花炮、玩烟花之俗则如《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最早源于辟邪，具有巫术活动的性质。元宵节赏花灯与太阳崇拜有关，也具有辟邪的巫术意义，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存留着这一习俗，比如火把节等等。后来随着火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这种古老的自然崇拜逐渐转变为人们的生活信仰和节日期间的一种习惯。因此南北朝时期灯笼的发明

为后来的灯节奠定了基础，而明清之后更是在灯节的基础上增加了猜灯谜这一经久不衰的文化民俗内容，《红楼梦》中关于灯节以及猜灯谜的描述恰恰可以证明这种民俗到明清时期的发展。还有中秋祭月、芒种日“饯花会”、“消寒会”等丰富的岁时民俗现象，无不体现了《红楼梦》这一中国古典文学巨著浓重的民俗色彩。

精神民俗方面：

作者提及了贯穿《红楼梦》全文的因果宿命论，还在佛道儒三教并行的社会背景下分析了当时满清社会中国人民的精神民俗内容。语言文化民俗方面作者从满语、谚语、口语三大方面简单介绍了《红楼梦》中的语言文化。语言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创作和传承活动，具有变异性的特征，因此语言也就在传承中得到了发展，进而形成了今天的现代汉语。《红楼梦》前80回中就包含民间俗语近200条，其数量之多、构思之巧是其他同时代作家不可企及的。书中包含很多已经失传的北京俗语、汉语中夹杂着满洲语等等，都是研究民俗学和语言学的珍贵资料。

综上所述，《从〈红楼梦〉的民族事象看其民族学价值》一文作为中国《红楼梦》民俗学研究的第一篇论著，虽然在内容的分析上略有不足，比如在除夕这一节日的分析上知识简单罗列了传统民俗资料和《红楼梦》文本中的内容再进行比较，并没有具体分析节日民俗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这更像是文学性的比较而非民俗学的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文章仍然在《红楼梦》民俗学的研究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证明《红楼梦》对于研究我国满清时期社会民俗事象及其变迁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

2、志乔《〈红楼梦〉中民俗现象及其民俗学价值初探》

1992年志乔发表在河池师专学报（1992年第一期）上的《〈红楼梦〉中民俗现象及其民俗学价值初探》一文篇幅较短，其构成与上述第一篇论文相似，从礼仪民俗、服饰民俗和节日民俗三方面介绍了《红楼梦》中的民俗现象。

礼仪民俗方面：

着重从婚礼角度进行分析，提到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婚俗现象“吃茶”，而贾宝玉和薛宝钗订婚时就出现了这一做法。宋代经济发达，采茶叶不断发展，市井之中也不断出现茶坊、茶肆等等，茶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随处可见。至南宋时期，茶开始进入婚姻程序之中，但也只是萌芽阶段，并没有明确茶在婚礼过程中中国的作用。到了明代才有了以茶为礼的习俗，取“从一而终”之意。在《红楼梦》第九十七回“宝钗出闺成大礼”中婚礼的程序也正如书中所说是按“金陵旧制”来进行的，这正是汉族人典型的婚嫁习俗。

服饰民俗方面：

主要介绍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些典型服饰。作者点明“有的是明代旧制，有的则是满清礼服”，但作者并没有列举出具体的证明加以佐证。

此外，节日民俗方面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为例，举出文中相应的节日民俗描写，并简单分析节日民俗的来源。由此可见该文章的问题：选取的参考文献较少，分析的部分也只是简单列举《红楼梦》文本中的民俗描写，对照研究也略有不足。

3、胡文彬《〈红楼梦〉与清代民俗文化》

1997年胡文彬发表于《学习与探索》上的《〈红楼梦〉与清代民俗文化》一文也是20世纪90年代《红楼梦》民俗研究的重要论著之一。该文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清代民俗及特征，正如该文作者所说：“《红楼梦》‘所属时代’，即18世纪中叶的清代社会，要了解这个时代的‘风俗概况’，首先就要明晓清王朝建立的一些过程和它的社会成分的构成。”该部分介绍了18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背景，从满汉相互交汇与吸纳、南北民俗的相互交融以及西学东渐带来的中外文化的碰撞三方面来分析清代民俗的典型性和多元性，为下一步具体分析及总结《红楼梦》中的民俗特点打基础、做铺垫。

第二部分：介绍《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及特点。该部分从神话传说、传统节日、婚丧嫁娶、饮茶饮酒、和尚尼姑、寺庙园林等共十个方面分析了

《红楼梦》中所蕴含的民俗现象。神话传说部分作者选取了“女娲炼石补天”和“绛珠还泪”两个神话故事。这两个故事贯穿在整个《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之中。前者源自远古时期的“石头”崇拜，那块女娲补天不成遗留下来的石头幻化成宝玉的“护身符”，“石头”在，宝玉就聪明灵秀，“石头”不在，宝玉就、浑浑噩噩、疯疯癫癫，最后魂归青埂峰下。出于青埂归于青埂，是有始有终的表现。这条线索往往被之前的研究者们忽略。后者则源于娥皇女英哭舜帝，而后泪化斑竹的传说。林黛玉居住于竹林掩映的潇湘馆，且以潇湘妃子为号，就是对这段姻缘的暗示。最终林黛玉泪尽而亡，欠债的人最终还了债。这两个古代民间传说经过曹雪芹的创作，变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可见民俗资料是曹雪芹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

该论文中婚嫁礼俗、丧葬礼俗、饮食等方面与前两篇论文中的结论大体一致，选取的片段和分析的方法也都大同小异。但是与之前几位研究者相比，胡文彬注意到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带有“不吉利”和负面色彩的节日和民俗现象，包括清明节和带有原始迷信成分的放风筝、捡佛豆、结寿缘等。在介绍寺庙景观的部分中，还注意到了佛教中的特殊人群——尼姑。以往的民俗学著作中往往只注重佛教的传播以及以男性为主体也就是和尚这一群体的描写，比如赖头和尚等等，但没有人注意过尼姑这一特殊却又充斥在《红楼梦》各个情节中的女性群体。《红楼梦》是一部女性的百科全书，不同的女性角色构成了这个庞大的故事体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胡文彬选择尼姑作为新的关注点具有不一样的意义，也为后人研究《红楼梦》中的女性开辟了一个新道路。同时胡文彬还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亦古亦今、亦满亦汉、亦南亦北、亦中亦外、亦雅亦俗。“亦古亦今”这一特点在《红楼梦》全书中皆有体现，虽然开书作者就点明此书无朝代纪年、地域邦国可考，但大家一致认为该书描写的故事是18世纪中叶清代的社会现实。而从民俗的角度看，小说中的民俗里既有从古代沿袭下来的民俗，也有小说诞生之时正在产生和流行的民俗。而“亦中亦外”这一特点值得人注意和深思。以往对《红楼梦》的关注点都是在于满汉融合、南北融合的民俗特征，这是第一次出现中外文化交融的观点。作者

通过《红楼梦》中对大量舶来品的描写总结出这一特点，也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结合18世纪中叶清朝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状况，进一步具体分析和研究《红楼梦》中中外交融的民俗或者中外交流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研究课题，都是后来学者可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第三部分：《红楼梦》中民俗描写的艺术价值，作者从“揭示小说主题并深化主题”、“暗示小说历史背景，增强时代感”、“营造故事氛围，推进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展开”、“加强生活环境的典型性”以及“丰富人物形象，深化人物性格，使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富有立体感”等五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部分是典型的文学视角下的研究，分析了民俗学在《红楼梦》成书过程中对社会背景、人物塑造、情节推动等方面的作用。

纵观《红楼梦》文本，民俗学现象纷繁复杂。试看《红楼梦辞典》开列的细目：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红楼人物（命名）、文中人物、地理等等，共21项。胡文彬所著的《〈红楼梦〉与清代民俗文化》一文中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面面俱到，但对于《红楼梦》的民俗学研究思路的启发具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它更像是一篇对于《红楼梦》中民俗学内容的总结，同时它也提示着后人可以关注清明节等常人觉得“不吉利”的节日，也可以在研究人物时多多关注女性，开展《红楼梦》中的性别研究。但是笔者也发现了一个普遍问题，不管是胡文彬的这一篇文章，还是后来的学者们对《红楼梦》中的宗教研究，都鲜少有人提到“佛教的世俗化”这一社会背景。在《红楼梦》中的多位尼姑角色，从偷情的小尼智能儿到图财害命的老尼净虚，从傍身佛门带发修行的妙玉到躲避凡尘俗世遁入空门的惜春，可以看出当时的女性把佛门当成了她们的避难所，当受到了社会的压榨与迫害的时候她们就会选择走入佛门寻求庇护，这正是因为佛教世俗化这一大的时代背景的推动。所以笔者认为这也是今后《红楼梦》宗教研究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20世纪90年代的《红楼梦》民俗学研究已经注意到了一般古典文学作

品中的民俗学现象，但研究仍然处在初步阶段，研究者以文学研究者为主，研究资料多为文献资料，缺少实际情况的真实记录。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还是很少自觉借鉴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是不自觉的偏向文学视角的研究。

三、21世纪以来的中国“红学”的民俗研究

21世纪初期，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片面的全盘继承逐步转变为在新时代下的创新与发展。与此同时，对中国古文学作品在民俗学领域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2000年以来共出版了4本《红楼梦》民俗学著作，分别是王齐洲、余兰兰、李晓晖（2003）《绛珠还泪：〈红楼梦〉与民俗文化》、赵云芳（2015）《民俗学视野中的〈红楼梦〉》、马瑞芳等（2016）《明清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和宋德胤（2016）《〈红楼梦〉与民俗美》。

1、王齐洲、余兰兰、李晓晖（2003）《绛珠还泪：〈红楼梦〉与民俗文化》

该书的成书正是受到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钟敬文先生《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一文的影响。1985年钟敬文先生在采访中提出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应当借鉴民俗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前文已具体阐述），这也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因素。该书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齐洲与他的两位学生共同编写，详细罗列了《红楼梦》中的男女穿戴、饮食、节日、礼仪、娱乐、建筑等方面的民俗，并选取了大量的历史记录、史书典籍等与《红楼梦》中的民俗进行对照比较。比如在男女穿戴的部分以宝玉的装束为中心，摘出了有关宝玉服装、鞋帽、腰带、汗巾、荷包、扇袋、项圈、寄名锁等各种段落，并选择了《阅世编》与之进行比较分析。《阅世编》与其他历史资料相比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记录了明清之际以松江为中心的这一地区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从明代到清代所发生的变化也让人一目了然。经比较发现贾宝玉的服装与饰

品基本符合书中所记录的相关特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红楼梦》中所描写的服饰与装束符合史实。但因为松江地处中国南方，此参考资料只能作为南方的历史记录而不能代表全国。胡文彬在《〈红楼梦〉与清代民俗文化》一文中指出《红楼梦》中的民俗具有“亦南亦北”的特殊性质，那么中国北方的服饰习俗又是什么呢？这就体现出参考资料的选取存在漏洞。

又比如饮食的部分中讲到了喝茶的相关段落。此处选用了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作为对比的对象。《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宋朝的社会风貌，由于坊市制度的兴起，市民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前文也提到过，宋朝经济发达，采茶业在江南一带发展壮大，因此茶作为一种饮品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但《红楼梦》作为清代的文学作品，与宋朝相距甚远，在此期间中国的茶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是因何而发生变化，这些并没有在书中有所体现。写到酒与酒具的部分作者注意到书中除了国内的各种好酒以外，还出现了西洋葡萄酒。这种西洋葡萄酒是欧洲输入我国的舶来品，在清初时期十分珍贵，通常只存在于教堂，普通人难得一见。作者还参考了康熙二十五年和四十八年的上谕和历史记录，发现康熙皇帝十分喜欢西洋葡萄酒，并对此酒大加称赞，于是从西洋传中国的葡萄酒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提及葡萄酒的诗文也慢慢增加了。这也表明了清朝中外饮食文化的相互交融。而贾家作为当时的名门望族，在饮食上一定会受到影响。

再比如节日部分的相关民俗，岁时节令是中国民俗的集中体现，曹雪芹不吝笔墨对《红楼梦》中的节日场景与活动进行描写，因此该书作者也用了大量篇幅罗列了《红楼梦》中有关的片段。例如除夕及春节的部分作者选取了四部历史记录与原文进行比较，分别《荆楚岁时记》、《清嘉录》、《燕京岁时记》和《帝京岁时记》。《荆楚岁时记》是南北朝梁宗懔所著的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楚地（即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清嘉录》是清代道光年间苏州文士顾禄所著的记录清朝苏州及附近地区节令习俗的著作。《燕京岁时记》和《帝京岁时记》都是按一年四季节令顺序，杂记清代北京风俗、游览、物产、技艺等民俗资料的历史记录。由此可见此处作者选取的参考资料十分全面，从南北朝到清代，从北京到苏州再到江

汉，涵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泛，参考价值也就更大。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绛珠还泪：〈红楼梦〉与民俗文化》一书与20世纪90年代的论文相比，民俗事项的选取更多，分类更加广泛，在参考资料的选择上也尽可能的向民俗学中的机能主义靠拢，即采取“通时”与“共时”的研究方法，以时间和空间为基准，对《红楼梦》中的民俗进行比较的研究。但由于材料的选取上依然有所缺失，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也并不清楚，因此借鉴的效果并不理想，更多的还是在用传统的文学研究手法，对原文进行摘抄和罗列。

2、赵云芳（2015）《民俗学视野中的〈红楼梦〉》

2015年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赵云芳出版了《民俗学视野中的〈红楼梦〉》一书。该书不再拘泥于单纯的民俗学知识的罗列和比较，而是试图挖掘一种新的视角来解读《红楼梦》中的民俗学相关内容，即《红楼梦》作者对民俗学的利用方式以及民俗学内容在《红楼梦》文本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原生态民俗在《红楼梦》中的“再利用”。

在《红楼梦》文本中，作者并不是将中国古代民俗原封不动的照搬进故事中，而是针对文本内容，选取所需部分进行了解构与重建。比如在节日部分曹雪芹在安排薛宝钗的生日时就巧妙的化用了中国古代的传统节日——穿天节。穿天节最早出现于宋朝庄绰《鸡肋编》，是襄樊一代的传统节日，在每年的正月二十一这一天妇女们用彩线穿石，以此纪念郑交甫向汉水女神求爱的故事。在刘向的《列仙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郑交甫在汉水遇到两位佩戴珠子的美丽女子，便一见钟情，向两位女子求珠示爱但无果。同时，相传女娲补天的日子就是正月二十一，这两种民俗意象相结合，便合成了薛宝钗的人物形象。“补天”与“求珠”刚好移植在了宝玉和宝钗身上：薛宝钗爱贾宝玉无果，而贾宝玉又刚好代表着女娲补天所剩的顽石。这就使得薛宝钗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更能表现出作者在这一人物上的用意。而在民俗意象与人物形象构成的部分中，作者注意到了人物服饰色彩、形象气质以及姓名与人物性格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未被涉及且十分有趣的分析角度。在此

书的后半部分则是对《红楼梦》中的口承民俗的介入以及民俗纠葛（包括信仰民俗、节日民俗以及游艺民俗）在文中提供的人物原型以及所制造的情节冲突进行解读。在这一部分选取了大量的民间文学元素，比如民间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具体的人物像，来分析口承民俗也就是民间文学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重大影响。

总体来说，赵云芳的《民俗学视野中的〈红楼梦〉》一书不困于以往民俗学的传统分析思路，而是另辟蹊径，通过对细小的、不被注意到的民俗学细节来分析《红楼梦》中的民俗学。作者站在民间文学与文艺民俗学的角度，在新的时期对《红楼梦》进行新的解读，是“红学”的民俗学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的以一次突破。

3、宋德胤（2015）《〈红楼梦〉与民俗美》

宋德胤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自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进入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师门，专攻民间文学、民俗学和文艺民俗学。宋德胤的研究涉猎范围广泛，包含了民间文学、文艺学、美学、少数民族文学及红学等各个方面。在宋德胤的研究生涯中最大的成就是以一种特殊的文化研究视角研究中国的渤海文化，研究角度涉及了渤海与邻族的关系、渤海地区的民俗、渤海地区的婚俗、渤海的货币揭秘、渤海的经济民俗、渤海的民族精神等等。由此可见，宋德胤先生不仅在民俗学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十分善于区域性的民俗研究。

该书就是宋德胤的一本“红学”论文集，在书中作者探讨了《红楼梦》中的饮食习俗、居住习俗、服饰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信仰与禁忌习俗、民间文艺习俗、民间游艺习俗、经济习俗、方言和俗语等。书中论文多以传统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以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为重点，对《红楼梦》文本中所蕴含的民俗学事象进行分析与解读。书中最大的亮点非《红楼梦》中的俗语研究莫属。在《〈红楼梦〉俗语汇释》和《〈红楼梦〉俗语论》中作者详细解读了《红楼梦》文本中作者引用和原创的各种俗语，除了解释意思之外，还分析了俗语在塑造人物形象、预示和指导全文情节以及深化主

题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同时作者还将《红楼梦》文本中所有的俗语按照首字母笔画和首字音序的顺序进行排列，建立了《红楼梦》俗语索引。其工程量之大令人赞叹，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

4、马瑞芳编著（2016）《明清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

2016年出版的《明清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是在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马瑞芳的带领下，一群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试图总结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与特色而写成的一本书。该书运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名的几部小说所描写、表现、反映的民俗事象，按信仰禁忌、祭祀占卜、人生礼仪、岁时节日、衣食住行、民间文艺、家族制度等分类别进行整理。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地域特征的分析。比如对《聊斋志异》、《水浒传》等作品的分析就会联系山东当地风俗特征与传统，而对《红楼梦》的解读则是着眼于满族风俗与东北风俗，这也是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在《红楼梦》中满俗汉俗皆有，但以满俗为主；南俗北俗皆有，但以北俗为主。因此作者充分联系清朝当时的时代背景，对满族入主中原与汉族地主联合共同缔造的封建王朝的多元文化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除了清朝满汉共存的现状之外，当时以满洲为中心的八旗聚居区也形成了独有的经济、文化圈，同时国家推行“旗民分治”的政策，限制了满汉民族的交往，形成了以满族文化作为主导文化的满族生活圈。这使得满族人能在汉族人的包围下还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可以有选择的吸收圈外的汉族文化。曹雪芹本是汉人，后入满籍，深受满族京旗文化的影响，而这种京旗文化正是《红楼梦》创作最直接的文化背景（该部分内容详见〈明清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第六章）。

在前半部分介绍《红楼梦》中所体现的满族生活习俗时，作者按服饰习俗、饮食习俗以及其他生活习俗进行分类，社会习俗的部分则是分为称谓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生育习俗和礼仪习俗。同时还介绍了满族的信仰与祭祀习俗以及游艺习俗。该部分在参考《清朝野史大观》、《清稗类钞》、

《燕京岁时记》等记录清朝风俗习惯的记录的同时，作者还采用了多篇前人的论文作为参考资料，这样有利于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发现前人研究的问题也十分有帮助。后半部分作者还侧重考察了满清的蓄奴风俗和与汉族不同的以姑娘为尊的重女风俗。这两个角度是以往的《红楼梦》满清民俗的研究者们没有注意到过的。

笔者认为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参考文献的选取。除了前文提到过的中国古代风俗记录和前人的论文与演技翰过之外，作者还选择了一些古代朝鲜的文献记录，如《李朝实录》，还有记载了《清入关前史料》的《建州见闻录》等等。无论是传统的民俗学研究还是新时期民俗学的跨学科研究，对照资料的选取无疑是重中之重。在本土的资料与记录的基础之上，能适当选取他民族的参考资料，能够帮助研究者多角度的且更客观的解当时的历史状况和乡土民俗。从这一点上看，《明清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实现了一次新的突破。

小结：今后《红楼梦》民俗研究的方向及方法

透过对上述先行研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目前《红楼梦》的民俗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从民俗学视角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和方法并没有确立。在中国《红楼梦》民俗学的研究大多数还局限于文学性的研究：通过对民俗的分析来体会民俗事象在文本中所起到的作用，如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等。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也多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即单纯的罗列与比较。由于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固定，研究方法也就逐渐趋向于单一。与此同时，单纯的文学性分析也并不能达到发展民俗学的目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有以下三点问题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第一、采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应该与民俗学相结合，这样就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一样的收获。但老一辈的民俗学家虽然提出了在今后的文学研究中采取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但并没有提出民俗学这一学科具体的理论构建以及研究中的具体方法。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真正选取民俗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真正达到中国古代文学与民俗学的有机结合。

第二、参考材料的选取：

以往的《红楼梦》民俗学研究中，虽然也选取了相当多的参考文献与资料，但选择的目的是与方向并不明确。就如前文所写，《红楼梦》中的民俗涉及南北、满汉、中外等各个方面，因此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要借助前人普遍选取的中国古代某地区、某时期的民俗学方面的记录，且时间要涉及到《红楼梦》成书前后，地点应包括中国与外国、中国南方与北方，还要参考《红楼梦》相关的图画与绘本、古代满族风俗记录以及现在的满族民俗学报告，对《红楼梦》中所蕴含的民俗学知识进行分析和研究，再参考记录了当时中国本土对于西洋文化的吸收和接纳的相关文献，以明确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民俗学发生的变化。

第三、明确研究重点、以小见大：

《红楼梦》文本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其中有太多值得研究的民俗。因时间与能力有限，将选取《红楼梦》节日民俗中的清明节，以满族与汉族民俗的对比为重点，将细小的研究内容做精、做细，借助前人的各种研究成果与上述丰富的参考资料与文献，采用民俗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红楼梦》中的民俗进行深度的研究，以达到从真正的民俗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董晓萍（2016）《钟敬文留日研究：东方文化史与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21-32页
- 2、胡文彬（1997）《〈红楼梦〉与清代民俗文化》，《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1期第118-124页
- 3、穆光（1991）《从〈红楼梦〉的民俗事象看其民俗学价值》，《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03期第118-126页
- 4、马瑞芳（2016）《明清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 5、祁连休、程蕾、吕微（2008）《中国民间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 6、宋德胤（2015）《〈红楼梦〉与民俗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7、孙玉明（2006）《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8、王齐洲（2003）《绛珠还泪：〈红楼梦〉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9、苑利（2002）《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民俗理论卷，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10、赵云芳（2015）《民俗学视野中的〈红楼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1、钟敬文（1998）《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 12、钟敬文（1998）《民俗学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 13、周汝昌、晁继周（1987）《红楼梦辞典》商务印书馆
- 14、志乔（1992）《〈红楼梦〉中的民俗现象及其民俗学价值研究》，《河池师专学报》1992年01期 第45-48页